

〈牛車〉在「滿洲國」

——論呂赫若小說的首次譯介與大連文壇*

劉恆興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呂赫若〈牛車〉一文創作，和該文本在滿洲國翻譯、傳播和造成的影響。在前者方面，目前學界對〈牛車〉的探討，集中在辨析作品中所反映的殖民現代性，並就此判定作者對殖民政策的態度。本文持論以為，日本殖民政權所推動的現代性確實存在巨大問題，但不可否認對群眾亦有其誘惑力。〈牛車〉作者對群眾生活現實有深刻體會，並且理解殖民地社會存在的矛盾。因此，他深知只有凝聚群眾共同生活的情感，才是對抗殖民現代性的有效方式。

在後者方面，一般〈牛車〉於上世紀三〇年代傳播的討論，集中在胡風翻譯。但事實證明，最早注意並翻譯〈牛車〉的是仲公撰，並發表於大連《滿洲報》的副刊「北風」。本文比較前述的兩個翻譯版本，並針對〈牛車〉刊登前後大連文壇討論的文學議題及作品進行分析。首先指出仲氏翻譯的內容文字，相較於胡風版本，較能反映呂赫若原作所企圖表達的概念與想法。其次，根據相關後續的發展來看，呂赫若〈牛車〉的翻譯出版對大連文壇顯然有相當影響，特別是在後續鄉土文藝理念的發生與提倡方面。

關鍵詞：呂赫若、牛車、翻譯、滿洲國、殖民現代性

* 承中研院楊貞德研究員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修改意見，特此致謝。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4-2410-H-260-041 研究成果。

“Cattle Cart” in Manchukuo:

A Study of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Lu Heruo's Literary Work and Dalian Literary Circles (1935-1936)

Liu Heng-Hs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Lu Heruo's(呂赫若) literary work of “Cattle Cart,”(牛車) and the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influence of this text in Manchukuo. As far as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Cattle Cart” in the present academia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lonial modernity reflected in the work, and Lu's attitude toward the Japanese colonial polic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lonial modernity promo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did have enormous problems,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modernity was also attractive to the masses in Taiwan. Lu Heruo had a deep grasp of the livelihood of the masses and understood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lonized Taiwanese society. He therefore knew that on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mmon emotions of the masses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resist the modernit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For the latter, the discussion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Cattle Cart” in the 1930s generally focused on Hu Feng's(胡風) translation. However, it turns out that Zhong Gongzhuang(仲公撰)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translate the “Cattle Cart” and published his translation work in the *Beifeng*,(北風) a literary supplement of *Manchu Newspaper*(滿洲報).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wo previous editions, and analyzes the literary debates and works published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of Dalian before an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Cattle C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ent and text, firstly, we believe that Zhong's translation, comparing with Hu Feng's version, can more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concepts and ideas expressed in Lu's work. Secondly, according to relevant and de-

velopments,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attle Cart” in Manchukuo obviously ha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the Dalian’s literary circles, especially in the ideas of gen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follow-up native-soil literature.

Keywords: Lu Heruo, “Cattle Cart”, Manchukuo, Translation, Colonial Modernity



〈牛車〉在「滿洲國」

——論呂赫若小說的首次譯介與大連文壇

一、前言

上世紀二〇年代，台灣興起新文學運動浪潮。由新、舊文學辯論拉開序幕後，隨即爆發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論爭，探討普羅文學和本土認同等問題。從話語中可以理解台灣文學者如何透過書寫本地社會，試圖推動社會改革的理想。1935年，呂赫若在日本《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處女作〈牛車〉。由於深入刻畫台灣日暮途窮的農村和勢在必行的工商經濟形態，以及身處其間底層群眾的辛酸苦痛，¹當時便引起台、日文壇廣泛關注，並且被胡風翻譯成中文，收錄於《山靈：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中，1936年4月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

胡風對中國讀者熟悉〈牛車〉，確實居功厥偉。但文獻表明，胡風版本並非〈牛車〉第一次被譯介。早於1935年4-7月間，仲公撰就以沉默為筆名，使用東北話文翻譯〈牛車〉，發表於《滿洲報》文藝副刊「北風」。²非但早於胡風版本，與〈牛車〉發表的時間，更僅相隔四個月。扣除翻譯及報刊編輯審閱排定刊登時間，幾乎可謂同步。

〈牛車〉具備何種獨特時代、社會與文學特質，成為台、滿、中國文學者交流互動的重要選擇？從出版時代背景看，當時國際間社會主義思想方興未艾，浪潮席捲世界各地。「半殖民地」的中國，與已然淪為殖民地的台灣與滿洲國皆受影響，借鑒對方文學創作一事本身並不出奇。然而〈牛車〉在省思本地社會問題時，超越政治、階級意識限制的企圖卻十分明顯，這使得文本呈現

1 施淑，〈最後的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張恒豪編，《呂赫若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10）

2 呂赫若著，沉默（仲公撰）譯，〈牛車〉，「北風」，《滿洲報》，1935.04.23、04.30、05.07、05.14、05.21、05.28、06.04、06.11、06.18、06.25、07.02、07.09連載，10版。

出相當程度心理搖擺和掙扎，甚至引發不同精神樣態詮釋的各種讀法。³ 本篇小說創作思想意識為何，又何以吸引了同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下文學者的高度關注，恐怕仍有待進一步釐清。

循此脈絡思考後續產生的問題是，仲公撰稱企圖引進外地文學推動滿洲文壇發展，基於翻譯者和被翻譯者間需要一定社會意識交集，因此選譯〈牛車〉。⁴ 那麼，譯者如何理解台灣和滿洲國彼此間文壇與社會關係？二者究竟存在何種共通性？這些共通性對推動滿洲文壇發展又有何重要性？仲公撰翻譯〈牛車〉的背後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等方面的動機，應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回首當時台、滿兩地文壇和社會氛圍，做為社會一分子的文學者關懷著推動改革。但在中國內部改革動盪延滯和日本殖民雙重壓迫與對立矛盾下，思考本地社會主體性的存在，並進行社會各階層間的話語互動，顯然是更為急迫性的問題。本文試圖透過文本翻譯背景切入這段歷史，在去殖民的思考視野下，審視台灣、滿洲國文壇之間的互動和交流，重新發現殖民地文學更為深刻的價值意義。

二、現代性「傷痕」：〈牛車〉與台灣本土意識

一戰後，全球殖民地要求獨立的浪潮風起雲湧。面對世界變局，日本殖民者採取高壓懷柔兩手策略，以現代化發展為號召，針對社會風俗、法律、衛生、語言、教育等生活面進行制度性改革，塑造出殖民者優勢地位象徵，由此建立話語秩序中的有利位置，被殖民者則被賦予未開化形象。根據此種殖民現代性的論述策略及特徵，尾崎秀樹以作品反映的階級和民族意識做為標準，將〈牛車〉歸類為搖擺於接受命運與反抗之間的作品，認為其反抗精神，相較於楊逵〈送報伙〉，呈現弱化傾向，展現殖民地知識分子精神情感層面的某種「傷痕」。⁵

然而〈牛車〉是否適合進行如此解讀，仍有待進一步商榷。首先，就殖民

3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台灣文學備忘錄——台灣作家的三部作品〉，《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11），頁237-246。

4 呂赫若著，沉默（仲公撰）譯，〈牛車·附白〉12，「北風」，《滿洲報》，1935.07.09。

5 同註3。亦詳下文。

本質層面來看，台、日同屬東亞文化圈，儘管政治對立，文化卻具有相似性，而且在國體意識思維主導下，日本同化政策呈現出矛盾和斷裂，無法完全掩蓋被殖民者在各種層次所受到的不平等對待。⁶種種因素使日本殖民者不能在話語上佔據實際主導權，破解殖民現代性恐已非台灣文學者關注的焦點。

其次，自〈牛車〉創作的時代背景來看，台、日文壇雖然互動關係緊密，雙方思考卻存在一定落差，特別在1920年代末，日本左翼文學者開始轉向或步入地下化鬥爭以後。⁷日本左翼轉向雖是為政治壓力所迫，但該陣營文學者思維已有實質變化。丸山真男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思想基礎乃是透過家庭、人倫的外在規範要求日本臣民，企圖解決社會內部的對立問題。⁸日本殖民政策因此存在以「忠孝」實踐道德的特殊狀況。⁹此一循外在、單一理性理解現實的途徑，對日本不分左、右的近代知識分子思維，其實影響甚鉅。

日本社會主義文學者對殖民地文學發展的思考，便可以看到此單一化傾向。如山川均雖對台灣表示同情，指出做為無產者，日本左翼對台灣社會發展有其責任。¹⁰其將台灣社會問題根源指向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以此做為化解台、日衝突的方針，企圖將台灣問題「同化」為日本問題處理的心態十分明顯。

文學方面也有類似狀況。三〇年代中起，楊逵、呂赫若等台灣作家開始現身日本文壇並受到矚目。宮本百合子對此評論為：

以前是做為他國的日本語，現在卻變成殖民地大眾的語言，甚至不斷地深入更廣泛日本的勞動大眾的心中，成為他們表達自己情感的工具。這

-
- 6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1），頁146-153。
 - 7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中國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02），頁460-461。
 - 8 丸山真男著，區建英、劉岳兵譯，《日本的思想》（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05），頁30-38。亦參見丸山真男著，林明德譯，《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12），頁93-97。
 - 9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5），頁156-157。
 - 10 山川均著，蕉農譯，〈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08），頁35。

不由得讓我聯想起烏克蘭文學發展的足跡，我們打從心裡為殖民地進步作家的抬頭而感到高興。¹¹

文中提及殖民地（烏克蘭）與母國（帝俄）關係的概念，顯示日本左翼陣營文學者轉向後，雖仍保持以本國社會主義和階級意識形態改革為核心的堅持，但在鼓勵殖民地文壇形成相對特殊存在的主張背後，其實隱藏促使台灣文壇和日本接合，成為支持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勢力一支的企圖。將烏克蘭和台灣文學相提並論，更是將台灣文學置入無產階級國際化框架中思考，闡釋殖民地文學對日本階級革命的價值。

但在日本文壇發展的台灣文學者，他們感受和想法又是如何呢？台灣文壇此前經歷國際反殖民風潮洗禮，在民族、階級、文學社會功能性等方面，基於差異立場不斷相互問難。包括從1921年至1928年間，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因大眾文化爭論造成分裂，1930年起黃石輝在《伍人報》以提倡鄉土文學之名，企圖將普羅文學引進台灣而惹起台灣話文爭議，和1932年後《南音》雜誌上基於民族／階級思想對立架構產生的後續交鋒，乃至1933年後吳坤煌、楊達等從國際關係視野，利用《福爾摩沙》、《台灣新文學》等雜誌，為台灣文學發展紛擾提出建言等。¹²可見台灣文學者對殖民地民族自決乃至社會主義所持相關理念主張並不陌生，甚至早已從中茁發出一定程度的共識。

山口守比較台灣與中國鄉土文學指出，中國以離鄉鄉愁為內含的鄉土文學早已被利用成為發展民族主義、甚至激進愛國主義，「他為性主張」的總稱，而台灣鄉土文學卻混合普遍性國家主義（Nationalism）和台灣本土獨特性（Nativism）的對立主張。¹³但從歷史觀點來看，甲午戰敗後清廷接受日本割讓台灣要求，代表當時中國當政者以為台灣、滿洲等地，是得之可以壯我國

11 中條（宮本）百合子，〈新年号の『文学評論』その他〉青空文庫，1935.02（來源：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11/files/2869_8457.html，檢索日期：2017.11.01）。

12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9.10），頁189-250。

13 山口守，〈作為契機的鄉土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期（2013.12），頁21-42。

威、失之於根本亦無大損的邊陲之地。¹⁴ 台灣知識分子早已理解欲掙脫日本殖民枷索，不能指望中國在現實面提供任何協助。台灣必須憑一己之力與帝國殖民政策周旋，爭取自主空間，未來才有獲得帝國內平等地位、獨立、或者重返中國的各種可能。因此從論爭文本來看，當時有關台灣改革發展的討論，焦點始終在於如何團結台灣本土群眾共同努力，為擺脫殖民地位創造契機。¹⁵

吳坤煌1933年底在《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雜誌發表〈論台灣的鄉土文學〉，¹⁶ 呼應共產國際主張及文藝思想，追求以民族為主要內含的普羅文學，企圖以辨證法調合民族、階級衝突；並引列寧主義對鄉土文學提出批判。似此看來皆標示台灣文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台灣知識界開始重視對外關係聯繫，企圖以此修正原本所堅持的主體性認知。

基於吳坤煌所處台灣文學轉折關鍵地位，以及與東亞各地知識分子交流所引發的重要互動效應，¹⁷ 學者也紛紛從場域、思想、理論、語境等角度切入，展開在民族、階級兩者間孰輕孰重，以及對鄉土文學所持立場各種詳細分析。¹⁸ 但是，若細讀吳坤煌此文，似乎仍可產生略有不同的一些體會。

在推動民族和階級意識發展，並設法調合二者衝突方面，吳坤煌一方面對於民族主義與資產階級意識緊密聯結關係極為清楚：

-
- 14 李鴻章割台復命奏折，表達最為明顯。其言稱：「奉天遼南雖退出多處，而營口至金、復一帶不肯稍讓，台灣兵爭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強占。或有為之解者，謂鳳、岫、金、復、海、蓋一帶，宋明以來本朝鮮屬地，我朝未入關以前所得，台灣則鄭成功取之荷蘭，鄭本倭產，康熙年間始歸我國版圖。今倭人乘勝踞朝鮮，遂欲兼併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敵焰方張，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區，如虎傅翼，後患將不可知。」見〈欽差大臣李鴻章奏中日會議和約已成摺〉（光緒21年3月26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第二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05），頁181。
- 15 黃石輝說法充份展示此種心理：「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見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原刊《昭和新報》142-144號，1931.08.15、22、29，此見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頁70。
- 16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を論ず〉，《フォルモサ》2期（1933.12.30），頁8-19。中譯文見涂翠花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75-86，亦見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頁123-135。
- 17 其中也包括〈牛車〉在滿洲國的譯介，詳下文。
- 18 相關研究參見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頁277-278；陳淑容，〈重讀吳坤煌：思想與行動的歷史考察〉，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頁22；徐秀慧，〈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國大陸與台灣「文藝大眾化」的論述為例〉，《現代中文學刊》23期（2014.03），頁34-46；賴松輝，〈普羅文藝批評的文化轉向——論吳坤煌對鄉土文學的批判與繼承〉，《台灣文學學報》29期（2016.12），頁39-78。

鄉土文學在封建時代萌芽，（中略）它的民族形式上的特色，被用來作為統治無產階級文化的古柯鹼；雖然經過新興資產階級的選擇取捨之後才被採用，但它的倫理觀和習慣的內容都脫離現實而失去價值，卻反而使它被否定、被埋沒。¹⁹

強調無論以文化傳統、山川景物、或懷舊情感做為彰顯民族性意義的鄉土文學都是必須被批判的。另一方面，吳氏卻又引述藏原惟人意見，強調各民族要「發展各自特有的文化」，兩者說法看似相互矛盾。但若放在「歷史的唯物辯證法」²⁰ 概念下，即可以發現在他的觀念中，民族與階級二者的內涵都已經改變：

因為我們為了對抗資產階級文化而建設的無產階級文化，通常不是只取代某個階級的另一個階級，而必需是比先前的資產階級文化更高層次的文化才行。（中略）如果無產階級文化只是對資產階級文化做機械性的否定，而不擷取其中的精華加以發展，就不能成為比資產階級文化更高層次的文化，更何況是成為未來全人類的文化基礎。²¹

無產階級不能機械性否定、但也不能直接繼承資產階級民族觀念。一個輕視破壞、對處理文化遺產有沒任何積極建設作用的學者，並不配稱無產階級文化專家：

列寧特別強調這一點，告誡那些輕視舊文化遺產的人們：「無產階級文化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是自稱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們的憑空捏造出來的。那都是十足愚蠢的論調。無產階級文化必須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

19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29。

20 即辯證法並非是對前命題單純的否定，而是透過將前命題吸收、轉化為新命題。用吳氏自己的話說，即是「不斷地自我否定，一點一滴地改變從前的形態，進化成一種全然不同的形態。」見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24。

21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32。

會、官僚社會的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之累積的合法發展。」²²

就這些說法來看，在吳坤煌那裡，民族、階級早已不是原有定義可以規範，而是不斷變動、必須透過辯證法持續進行超越的概念。因此，他一方面攻擊鄉土文學中文化傳統、山川景物、或懷舊情感已然與現實生活毫無瓜葛，一方面發出鄉土文學「民族形式上的特色」為統治者利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哀嘆。

推本可知，吳坤煌理想的鄉土文學，並非以無產階級意識為核心，排除資產階級意識與文化如此簡單概念下進行的創作。無產階級必須引導台灣各階級民眾破除統治者意識形態、認清壓迫本質，這才是階級間彼此「鬥爭」真正本意。為此他分析台灣（其稱南海小島）進行階級鬥爭的現況，指出本地無產階級運動已有其他階級人士加入，這是因為：

即使是生活過得比農民勞工稍微寬裕，好歹能活命的中產階級，或在中產階級之上的人，他們處在文化比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稍微落後的殖民地地位（台灣），也和被統治下的其他（歐美）殖民地的例子一樣，彷彿命中注定似地，受到血統差別的束縛，日漸走上沒落之途。²³

正因台灣社會與殖民宗主國日本的文化、經濟相比，落差不似歐美各殖民地那麼大，台灣群眾更容易體會殖民社會經濟之外的各種壓迫。因此他們從階級壓迫出發，已然逐漸發展出超越傳統語言、血源、傳統文化、經濟利益範圍之外，基於全體社會共同利益為目標思考的民族性：

因此，越來越多的人（資產階級）對自己的民族地位，不，更進展到對他們所處的階級地位有所自覺，知道自己該走甚麼樣的路。這種趨勢愈

22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31。

23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27。按：括弧內文字為後加，下同。

來愈激進，想必是台灣處在現階段的特殊情況下的一種現象。²⁴

清楚標明吳氏思考脈絡以及對台灣鄉土文學所持立場。事實上，當時國際局勢與之前相比也未產生改變，若從日本左翼轉向、當（1933）年初希特勒掌控德國政權，標示著法西斯主義開始崛起，第三國際承認原本左傾路線失敗，願意將民族問題納入思考等等，甚至可以說整體情勢正朝不利被殖民者的方向發展。日、中左翼陣營是否有意願，遑論能力，介入台灣問題都是巨大疑問。吳坤煌可以選擇思考恐仍是團結台灣內部社會、而非走向國際主義以對抗殖民的途徑。²⁵

然而這並非代表吳氏心態孤立保守。他深刻理解唯有透過文學中人類情感共鳴，而非理論思想或政治利益的結合，才有可能爭取到包括日、中在內等國際左翼勢力盟友，至少在精神層面真正的同情和支持。

因此在鄉土文學，特別是語言問題方面，他提出辯證性思考：在肯定鄉土文學中的民族動向及地方色彩前提下，以反映群眾生活為原則，依據生活面和觀點的不同，就會產生「形形色色」各種文學。但最富發展潛力和價值卻是以日語寫成的台灣文學。何以如此？吳坤煌以為這是因為台灣日本語文學反映深層文化壓迫，「不管接受了多少日本教育，日本語寫得多好，從小在各方面都遭受種種差別待遇的人們，誠實而具體地寫出他們的憤懣，自然就會出現和本國人不一樣的文學作品。」並且，這些作品指向光明之途：

（這些）作品中應該會充滿憂鬱性質，而灰暗悲慘的觀點自然地使作品表現顯得複雜。可是民族性的波濤還是在其中翻騰，形成他們和本國作家之間的鴻溝。如果繼續保持真正的感覺，一旦它接觸到一點點世界思潮，就會成為一種必然能發展成階級鬥爭的民族大愛。²⁶

24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27。

25 台灣文藝作家協會1932年回應日本左翼團體（J.C.B書記局）要求，可以發現台灣知識分子堅持，基於本地多民族混居事實，在民族問題上，必須建立異民族（含日本人，不包括政權）間共同社會意識，換言之「台灣本身非扮演一個主體角色不可」。參見施淑，〈文協分裂與三〇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06），頁19-22。

26 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28。

此處「本國」所指不明，按時代背景應是指日本，也不排除指中國的可能，但在解讀上並不形成影響。其具體主張為：台灣民族波濤已在翻騰，這或許會造成彼此鴻溝，但最終卻能在階級鬥爭的「民族大愛」下獲得同情和理解。

吳坤煌包括超越性民族意識、階級壓迫本質與台灣作家日本語創作特殊性等理念，都可以在〈牛車〉文本見到具體回應。²⁷ 仍應指出吳坤煌這些意見並不是突然產生的。經歷前期語言、文化論爭，台灣文學界在葉榮鐘提出所謂「全集團特性」主張時，早已出現與其類似看法。

如在「八面碰壁」、「混亂慘淡」的台灣社會，葉榮鐘提出「歌以當哭」的方式，進行文藝啟蒙。²⁸ 更具體來說，便是提倡超越階級、族群的「第三文學」：

一個社會的集團，因其人種、歷史、風土、人情應會形成一種共通的特性，這樣的特性是超越階級以外的存在。所以台灣人在做階級的份子以前，應先具有一種做台灣人應有的特性。第三文學是要立腳在這全集團的特性去描寫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共通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所以第三文學須是腳立台灣的大地，頭頂台灣的蒼空，不事模倣，不赴流行，非由台灣人的血與肉創作出來的不可。這樣的文學纔有完全的自由，纔有完全的平等，進一步也纔可以寄與世界的文學界。²⁹

強調在集體生活的結構基礎上，以同理心發展多元包容的共通社會文化。施淑先生指出此一主張：

這不像一般啟蒙思想者之空談普遍人性，而代之以集團意識；要求自由平等，而不願喪失地域文化特性的文學主張，雖不曾標榜民族主義，在

27 詳下文。

28 奇（葉榮鐘），〈發刊詞〉，《南音》創刊號（1932.01），頁1。

29 奇（葉榮鐘），〈第三文學提倡〉，《南音》1卷8號（1932.06），封面裡頁。

主客觀意義上卻含有弱小民族文學的政治訴求。³⁰

便是指出族群與階級認同過於偏狹，必須參考本地群眾在生產消費、風俗習慣，以及人際互動等日常生活延續性行為所產生的經驗情感，以此修正並超越原有階級與族群狹隘的觀念。就此亦可以見到台灣社會主義文學思潮的脈絡性和統一性。

三、從楊達到呂赫若：〈牛車〉的繼承與發展

做為登上日本文壇第一人，楊達〈送報伙〉對呂赫若存在一定影響。但楊達與吳坤煌雖不能說涇渭分明，確實可以發現思想背景脈絡存在隔閡。³¹ 呂赫若卻從投入文壇伊始，便顯示嚮往和傾心於《福爾摩沙》，³² 由此需要進一步探究，楊達與日本左翼陣營結合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思考路線，³³ 是否可能因過份重視普羅和殖民地文學，忽略對台灣本土社會的關注，使〈送報伙〉與〈牛車〉間，如尾崎秀樹所指出的，存在某種思想、情感斷裂的可能？

在此不擬討論1935年後楊達是否有所轉變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肯定〈送報伙〉不能視為台灣改革企求轉向國際主義的先聲。回看1928年寫成的〈當面的國際情勢〉³⁴，學者多以為楊達此文中表達寄期望於日本左翼的想法，後續遭受到伴隨全球經濟恐慌而產生激進路線台灣農民組合的攻擊，與連溫卿一同遭

30 施淑，〈文協分裂與三十年代初台灣文藝思想的分化〉，《兩岸文學論集》，頁25。按：類似論點亦可見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03），頁19-20；陳芳明，〈現代性與本土性——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5），頁84。

31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05），頁317，註223。

32 呂赫若自陳在創作〈牛車〉前，曾完成小說〈南國風景〉一篇，投稿到《福爾摩沙》未被採用，後改寫成為〈暴風雨的故事〉。見呂赫若，〈處女作回憶——子曰空空如也〉，《興南新聞》4526號1943.08.23，4版。

33 關於思想發展的時代脈絡，參見郭誌光，〈從鄉土文學到殖民地文學：本格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文化轉向與文藝創新主軸〉，柳書琴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06），頁133-156。

34 楊貴（達），〈當面的國際情勢〉，原刊《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1928.05.07），亦載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06），頁80-82。

受批判與邊緣化，被迫轉向文學界發展。³⁵

但此文寄望日本左翼的實際內容又是如何呢？從原文陳述脈絡來看，他並非以為日本左翼將會取代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恰好相反，楊逵起始便指出，正如社會主義與反殖民族主義的急進發展，日本、美國以及因一戰殘破的歐洲「資本主義列國」也逐漸恢復，重新強大起來，雙方開始進入正面衝突階段。這是當前國際情勢所以危機四伏、充滿迫切性的理由。

楊逵寄期望於日本左翼，就原文來看十分清楚：日本雖是帝國主義國家，從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角度來看，國際地位與國內矛盾十分複雜。如日本出於殖民地問題考量不能不與歐美結合，但在擴張所得利益分配上又不得不與歐美對抗。換言之，日本帝國處在既是壓迫者又是被壓迫者的雙重地位，因此是最可能在民族與階級問題重新進行反省的帝國主義國家。³⁶

在更早發表的〈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中，³⁷可見楊逵在日本工學時期起便關心該國階級問題，並對國內嚴重勞資衝突和國家主義下勞方被壓抑、犧牲乃至無法反抗狀況深有體會。他瞭解日本近代遭受列強壓迫，產生奮發圖強的社會集體心理，卻為國內資本家營造種種自肥條件，導致社會極端驚人財富收入差距。在強調集體利益、犧牲個人的日本社會，勞動者無法反抗國家資本主義，只能卑微地思考「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問題。

楊逵關心參與日本左翼文學發展，因此不是單純以放棄本土、改走聯外反抗路線簡單說法可以解釋。他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展開互動，主要目的仍是企圖透過互動交流，推動東亞包括日本在內自主性反省意識的普遍覺醒。唯有東亞人民針對各地獨特性完成社會集體共識的建立，才有達成國際聯合陣線可能。³⁸

35 柳書琴，〈〈送報伏〉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台灣文學學報》29期（2016.12），頁1-38。

36 俱見楊貴（逵），〈當面的國際情勢〉，《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81-82。

37 楊貴（逵），〈自由労働者の生活断面—どうすれあ餓死しねえんだ？〉，原載《號外》1卷3號（1927.09），清水賢一郎、彭小妍據葉笛中譯文校譯，〈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楊逵全集》第四卷·小說卷（I）（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06），頁1-18。

38 探究這個企圖或許可以從楊逵當時對原作的修改，以適應日本社會和讀者加以解讀，但因與本文主題有所距離，在此不論。

那麼，楊逵又何以將〈送報伙〉投到東京《文學評論》呢？河原功曾提出折中解釋。〈送報伙〉發表過程坎坷，其「前篇」刊登在1932年5月19日到27日的《台灣新民報》，「後篇」卻遭查禁未獲刊登。因此河原功以為楊逵投稿《文學評論》，是以在日本文藝雜誌上揚眉吐氣，表達對總督府檢閱制度的憤慨和「一決生死的抵抗意識」。³⁹但《文學評論》和台灣總督府立場本就不同，本篇又並非楊逵首次登上日本文壇的作品，企圖利用〈送報伙〉衝擊台灣殖民統治制度，效果如何頗有疑問。再者，台灣（包括日籍）讀者須等到戰後才能完整看到〈送報伙〉，所謂「抵抗意識」說法似乎也只能局限於作者個人情感層面。

其實，楊逵以〈送報伙〉推動建立台灣集體意識的用心和想法，仍應從他突破總督府管制，自我宣揚該作言論中推想。鑒於〈送報伙——於楊逵（逵）君的作品〉⁴⁰一文寓意不明以及引起台灣本地文學者負面情緒，⁴¹楊逵在不到一個月間續寫〈靈籤與迷信〉，⁴²立場明確從宣傳轉變為自我申辯。此文針對賴慶〈迷信〉和自己的〈靈籤〉進行比較。賴慶是1930年代相當活躍、沒有鮮明政治立場的通俗文學作家。⁴³楊逵肯定其文字出色、選材用心，卻批判缺乏特色和新意、主題不連貫、敘述不連貫，不瞭解「文學是一種吶喊，致力於透過某一事件而具體地表達這種心聲才是『創作』。」指出做為資產階級附庸的作家，並無法引領大眾朝向理解社會壓迫本質方向前進。

而在後續回應徐瓊二、郭水潭和吳新榮挑戰的三篇文章，即〈台灣文

39 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伙〉——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台灣文學學報》7期（2005.12），頁120-148。

40 賴健兒（楊逵），〈新聞配達夫：楊逵君の作品に就て〉，原載《台灣新聞》，1934.10.24。邱振瑞中譯，〈送報伙：楊逵君的作品〉，《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83-87。

41 本文鼓吹殖民地作家應主動前進日本文壇，卻未說明理由。特別是大量引述德永直等日系評審意見，用意或許是說明該作品刺激日本左翼反省，但讀者似只感到作者藉日本文壇勢力進行自我吹捧。河原功稱：「發覺賴健兒其實就是楊逵本人之後，在為其專注與熱誠動容的同時，不免浮現一絲苦笑。這篇文章的執筆日期為『9月30日』，距離見報相隔長達三個星期之久。」同註39，頁143。

42 楊逵，〈靈籤と迷信：『革新』誌上に於ける楊逵氏と賴慶氏〉，原刊《台灣新聞》，1934.11。邱振瑞中譯，〈靈籤與迷信：《革新》雜誌上的楊逵與賴慶〉，《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89-93。

43 柳書琴，〈《台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2期（2012.08），頁1-39。

壇一九三四年的回顧》，⁴⁴ 以王氏琴為筆名所寫〈送報伙——一個女性的觀點〉，⁴⁵ 以及〈文藝是大眾的〉，⁴⁶ 都可以看到楊逵努力化解台灣本土文學者因親日文壇路線產生的敵視心理，企圖說明因個人階級和民族愛憎感覺所造成理解層面的破碎，造成無法理解和回應階級壓迫本質，對台灣社會追求解放所造成的危害。

在〈文藝是大眾的〉中楊逵較完整地闡釋自身理念。他首先指出文學是一種將生活獲得思想具體化為情感，而加以傳達的藝術。但是純文藝派作家卻忘掉讀者，專注於他們自己「狹隘的生活」，墮落成為「低俗、瑣碎的藝匠」。令人悲哀（或恐懼）的是，日本普羅文學者所創立的《文化集團》和《文學評論》也快要放棄階級鬥爭使命，變成「藝術至上主義的俘虜」。德永直等少數人雖然仍在堅強挺立，但整體來看，情勢相當悲壯。為此楊逵提出呼籲，台灣作家應該積極投入日本文壇發聲。

因為殖民關係，台、日本文壇連動性很高，基於「要掌握我台灣文壇，首先得認識日本文壇，為了決定我們的出路，必須觀察日本文壇的動向。」和「由於創作的職業化，日本文壇衍生出許多非文學性的因素」等理由，所以台灣作家應努力投入支援，迫使反動者讓步，協助日本無產階級文學者具備整合文壇的實力。這看似配合日本帝國左翼人士心態的主張，卻是立足於台灣文壇自主性思考：楊逵以為台灣文壇不但可以以日本為鑑、保有台灣文學不受商品化左右的樸素、真摯傾向，更可以「以批判的態度來吸收世界文學技巧上的成果」，奠定台灣文學於世界文學的地位。楊逵以台灣本土社會為主的想法明確，並因此肯定呂赫若〈牛車〉超越〈送報伙〉，更能打動人心，⁴⁷ 或許也是更能完成本土意識整合、推動台灣文學走向世界的作品。

雖未從理論性話語出發，楊逵與吳坤煌基本立場其實是一致的。兩人皆強

44 楊逵，〈台灣文壇一九三四年の回顧〉，原刊《台灣文藝》2卷1號（1934.12）。邱振瑞中譯〈台灣文壇一九三四年的回顧〉，《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115-123。

45 王氏琴（楊逵），〈新聞配達夫—女性はかう見る〉，《台灣新聞》，1932.11.28。

46 楊逵，〈藝術は大衆のものである〉，原刊《台灣文藝》2卷2號（1935.02）。邱振瑞中譯，〈藝術是大眾的〉，《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127-140。

47 同註46，頁140。按：關於楊逵企圖以殖民地作家身分，支援日本普羅文學的詳細過程，參見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逵——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越境交流》（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09），頁21-66。

烈要求台灣文學者必須和東亞，特別是日本文學者加強交流，但基礎都是以台灣文學者，尤其是普羅文學者能夠整合自己社會階級的分歧，引領各階級達成統一社會共識做為前提條件。但當時很多文學者卻忽略後者，以為楊、吳二人呼籲以日文創作，走向國際主義，不重視本土文壇發展，引起當時與後代很多不必要的口舌風波。

〈送報伙〉可以視為前述理念的具體實踐。其敘述一位台灣農家青年，在日本資方侵奪下，團結日本勞動者共同奮鬥爭取勝利的故事。本文相關研究討論很多，析論精闢者不乏其人，但在此仍可指出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某個細節。即主角體認到「和台灣人裡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似的，日本人也是一樣。」並在對比下產生矛盾的感受：「想到我現在的哥哥（巡查），什麼親兄弟，不成問題。拿他來比較都覺得對田中不起。」表面上看，主角似乎體悟到自己和田中基於階級而產生的友誼，已經更勝於具有實際血緣的親兄弟。作者彷彿同意日本左翼文學者主張，強調台、日群眾間基於理性階級身分認同的聯合。即〈送報伙〉透過階級在不同社會普遍存在的特質，解決殖民／被殖民在民族議題的衝突，將其從國家差異過渡為城鄉差異，進一步形塑出消弭階級對立後可能的社會風貌。⁴⁸

但若深一層就情感面思考，主角拿當巡查的哥哥和田中比較，表達極可能是反諷意味。即殖民政權對台灣社會的壓迫，除經濟剝削外，更嚴重的是在對人心形成負面影響及造成倫理情感傷害。主角親哥哥在殖民社會結構中謀求流動到上層階級，行為舉措悖離親情倫理，主角指責他時顯得義正詞嚴；但從「拿他來比較都覺得對田中不起」一句，卻可以感受因親屬感情牽扯而產生的痛苦掙扎。

作者跳脫階級意識形態的企圖，更可以就母親此一人物得到明證。就遺書來看，可以得知其死因並非是物質困乏：她斷然拒絕長子接濟，甚至直接將其驅趕出家門。母親所以上吊自殺主因是來自於負疚感，來自親身感受到鄉里親朋的悲慘遭遇，在為「全集團特性」，榮枯與共意識所不容的羞恥。也正是對

48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頁176。

母親心理的理解，主角對抗資產階級目的，不在消滅對方，而是要求勞動的合理報酬，成功後也未對資本家展開實質性報復。

台、日雙方社會差異在此被突顯出來：台灣社會虛假不公的進步發展，亟需推動改革，但不同於日本社會具備共同生活意識——這是主角參與的罷工運動得以成功的主因，台灣卻因政權異質存在，群眾生活休戚與共的集團生活意識已然被分化破壞，能否比照主角日本抗爭模式解決階級問題，顯然大有疑問。

〈牛車〉便是站在〈送報伙〉社會批判基礎上，進一步突顯問題所在。不同於〈送報伙〉迴避性的場景設定，〈牛車〉直接面對台灣社會現實問題：為供給殖民母國糧食，農業生產結構必須進行調整，傳統社會面臨轉型的痛苦，在新式車輛、現代道路引入農村後，牛車注定成為無法因應時局變化而必須被淘汰的產業。就此來說，確實容易產生作者與作品抱持殖民群眾無法逃離剝削，呈現被壓迫群眾的負傷感，臣服於「命定」論的印象。⁴⁹

但對於〈牛車〉應如何解讀，作者運作自我感知所反映出的情感思維，其實遠比現實情節本身來得重要。呂赫若指出，文學應當掌握真實生活，用雙眼觀看現實，從生活出發並且努力留意自己的生活，才是文學工作者應當採取的良好態度。⁵⁰ 確切來說便是：「『如何認識現實』這種面對現實的方法，和『如何運用藝術的真實性表現自然、歷史和人的思維』這種表現方法二者的統一。」⁵¹ 換言之，〈牛車〉之所以特出，並非只在客觀呈現傳統生產模式沒落和下層階級群眾敗亡，「如何認識現實」的簡單過程，更是在自然、歷史與生活層面，透過藝術的真實性表現出對人的意識的反省，文藝立場與楊逵、吳坤煌有相當的一致性。

由不同的理解方式出發，可以發現物質生產環境變化所產生人際情感與社會關係的破裂與對立，其實才是貫穿〈牛車〉一文的主要脈絡。現代生產模式

49 除尾崎秀樹外，呂正惠亦以為該作有強烈命定論色彩。見呂正惠，〈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頁41-66。必須指出的是，陳芳明並不同意此種意見，以為呂赫若其實並未接受殖民現代性神話式的宣揚，見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頁66-67。

50 呂赫若，〈文學雜感——兩種氣氛〉，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37。

51 呂赫若，〈文學雜感——舊調重彈〉，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頁126。

轉型本身不可避免存在痛苦不適，但是傳統生活記憶消失和情感疏離，才是造成楊添丁一家悲慘結局的主因。榮枯與共的集體生活意識在〈送報伙〉中仍有少許如母親般悲劇人物在維持，以提供未來遠景的想像，〈牛車〉中卻幾已蕩然無存，非但牛車夫、米店老板、農民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已經出現危機，連結合理應最緊密家庭間夫妻、子女關係也因為各自生存、彼此利益的問題，陷入極度低潮。

馬克思對這種現代工業社會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所造成勞動力異化早已提出清楚解釋，並指出嚴重後果：（一）階級分化，以及（二）勞動者的知識、判斷與意志必須屈從於雇主的權威：「所以，可以把工場看成一部機器，而人是機器的各個部份。」⁵²二者間雖未必存在必然因果關係，但在國家主義極端化的殖民社會，台灣已成為最大的工場，日本帝國成為最大的雇主，勞動者無法依靠自己原有的知識、情感與意志力生存。這才是〈牛車〉悲劇形成真正的根源。

在無法理解何以再怎麼努力也賺不到錢的楊添丁，聽到農民、消費者、米店老闆對話的一段情節中，作者明確表明此一概念。眾人間雖然有階級之分，卻只能被動依附在殖民者帶來的現代社會下，維持個人生存發展成為生活最大意義。也正因此，作者描寫底層牛車夫們因艱苦生活所激發階級共同情感以及反抗壓迫的行為，卻是曇花一現且毫無果效。⁵³

由此可以對文本產生進一步理解，台灣知識分子要求社會平等的同時，也希望推動社會在政經、文化等各方面的進步，這不免使其陷入思考上的兩難。要化解此種兩難，完成社會現代化與平等企求，且能避免殖民剝削造成的傷害，便需要全體社會成員，擴大情感聯繫範圍，擺脫甚至放棄階級、族群身分差異的糾纏，以共同生活為基礎進行相互理解，養成集團性社會意識。基於此，〈牛車〉描繪了底層群眾在殖民經濟下淪為外國資本家工具的痛苦，並由

52 馬克思、恩格斯著，《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9卷（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頁117、400。

53 施淑先生指出：呂赫若作品甚少表達旗幟鮮明的意識形態改革立場，筆下群眾對統治反感和反抗也是出於直覺和缺乏分析的，人物失敗結局因此無可避免。施淑，〈最後的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張恒豪編，《呂赫若集》，頁302-305。

此完整表現出社會層次共同情感記憶逐漸消失的狀況，為殖民地群眾的生活苦悶提供合理的解釋。

歸結來說，殖民政權推動的現代化帶來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層面的進步，集體生活經驗受破壞所導致的悲劇卻層出不窮。特別是台灣群眾多為勞動者，往往被迫改變人際與社會空間的隸屬感。且對多數群眾而言，感受到環境帶來的壓迫，卻無法透過思考掌握其問題本質。〈牛車〉中群眾對「日本東西」懷抱著敬畏恐懼心理，便具體反映這種情況，同時也表明台灣社會建構全集團意識的複雜和難度。

然而，〈牛車〉從心理層次描繪人物的情感變化，表現社會下層民眾絕望的現實困境，若就社會全集團意識建構過程來說，其實並不消極，且具有正面意義。其棄絕稍早乃至同時期台灣小說中，追求社會性所產生急躁、抽象性說教，以及過於急於突顯意義所造成人物或事件的不合情理。而將焦點集中在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具強大社會文化包容力卻迂緩、沒有組織，以生活實際感受為行動原則的社會真實面。呂赫若顯然意識到種族、文化乃至政治認同關係複雜的移民社會，無法以任何固定意識形態邏輯加以控制，因此透過群眾意識和生活感受的具體呈現，將殖民地社會問題歸結於外來政權介入，造成台灣社會群體關係的破裂分化。因此，文本反抗精神非但未有所弱化，反而進一步揭示其為不同地域、時代與文化讀者共同領略接受的可能性。

四、仲公撰譯作前的大連文壇

滿洲國〈牛車〉譯者仲公撰（按：官方資料登載亦稱仲同升、仲統生，1916-?），筆名有沉默，駱駝生等。旅順人。1932年赴日就讀早稻田大學專門部，1935年以官費學生身分進入日本東京工科大学。其留日期間除翻譯〈牛車〉外，亦參與《詩歌》朗讀會、《沙漠の歌》刊行紀念會等活動，結識吳坤煌、雷石榆、林林（林仰山）等台、日、中文學者，並與雷石榆、蒲風（黃日華）共同創立漠北文學青年會。⁵⁴ 〈牛車〉譯作於1935年4月23日開始刊登於

54 關於仲公撰留日相關活動，參見大久保明男，〈滿洲国の留学生駱駝生と東京左連〉，《中国東北文化研究の広場・「満洲国」文学研究会論集》2期（2009.03），頁137-156。其與台灣作家的交流，參見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頁310-318。

大連《滿洲報》文藝周刊「北風」，全文共分12回。

仲氏翻譯〈牛車〉之際，南滿文壇正值「（滿洲）文壇建設論爭」⁵⁵的初起階段。與台灣文壇早期狀況類似，此時左、右兩翼文學者們針對滿洲國本地文學發展方向，以及如何與世界文學交流互動等問題上，存在對立、無法兼容的分歧意見。如在與滕村人的文藝通信中，仲氏對大連響濤社提出批判，批評響濤社所翻譯的作品缺乏社會意識，美其名為滿洲國文壇打開世界視野，但實際只為獲取個人名聲利益，譯作多是「已經成了化石，也許有可以做我們考古、或歷史的材料，但是未必然便有他藝術底、現社會的價值。」⁵⁶

響濤社同人則回應兩點質疑：（一）文學創作確有時代畫分，但作品脫離讀者的社會環境，是否就不應列入翻譯之列？（二）仲公撰盛贊滕村人翻譯，願意將自己翻譯做廢：「似乎翻譯日本文學的人非得是在日本住過不為功，這又是一個大大的錯覺。」⁵⁷

雙方對文學本質和發展誠然存在不同意見。從普羅主義文學立場出發，仲公撰強調文學應建築在社會現實的認知基礎，凝聚讀者對社會改革共識；響濤社同人則認為自我意識對社會現實的轉化吸收更為重要，堅持作者個人意識的獨立性。二者所堅持的原則是一體兩面，⁵⁸原本無須如此劍拔弩張。討論所以演變為堅持自我理念，排斥對方立場，主因其實來自雙方對文學與現實關係，以及文學如何發揮社會影響力等問題認識不清。尤其後者又導致雙方本地文壇未來發展方向的分歧，和基於民族與階級情感衝突所產生嚴重的對立。這從響濤社島魂與王孟素對該問題發言，可以獲得進一步理解。

55 「文壇建設論爭」是1935-1936年間，於瀋陽（時稱奉天）《民聲晚報》「文學七日刊」與大連《滿洲報·曉潮》副刊，左、右翼陣營文學者以文學創作、作者主體與社會意識相互關係為核心，針對文學者個人階級意識與文藝社會功能所展開一場集團性論辯。參見劉恆興，〈文學、主體與社會：「滿洲國」文壇建設論爭的起源與發展（1935-1936）〉，《文與哲》30期（2017.06），頁129-178。

56 駱駝生（仲公撰），〈文藝通訊——附滕村人覆信〉，「曉潮」，《滿洲報》，1935.01.11，8版。

57 驚霓，〈給駱駝生〉，「曉潮」，《滿洲報》，1935.01.25，8版。

58 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探討翻譯問題時，提出作品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價值在於兩個層面，即能否找到能掌握時代環境的譯者，和作品本質是否適合翻譯。但在後續的論述中卻指出，二者都不是在簡單歷史背景下，或憑自然感覺與靈魂下能夠決定的。翻譯者必須理解作品在人類整體生命中的地位，以及作者身處時代的實現，並且在譯作中顯示屬於永恆來世生活的認知。瓦爾特·本雅明著，陳永國譯，〈譯者的任務〉，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後現代性》（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09），頁3-12。

島魂（孫世翰）以「無親無師」揭明對手無產階級身分，藉此暗諷其文藝理念並不顧念本地社會需要，盲目追求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並指出因此「我們響濤社的社員，還有一些翻譯作品出世，無論是詩或是文，總算讀者們還可以見著。」相對而言，左翼陣營對文學翻譯一事卻可謂毫無建樹。⁵⁹言下之意以為，由於滿洲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特殊，所謂反映暴露現實，在充滿政治壓力的滿洲文壇沒有出路，只有透過個體轉化後的情感真實，即便（翻譯）作品因個人領悟能力高低而有好有壞，皆給與鼓勵，使之善惡並陳才是發展殖民壓迫下滿洲文壇的正確方向。

孟素回應時則再度重申社會主義立場。以為進行翻譯作品選取時，近現代作品應較古典重要，古典作品應選擇已有定評者。理由是本地文壇「是建築在報紙的副頁，俗謂報屁股的」，版面資源有限，古典作品固然有其價值，「簡直也沒有地方安置它呢！」。⁶⁰換言之，孟素同意當前文壇面臨政治巨大壓迫，甚至思想情感現實轉化對文藝發展有一定重要性，卻無法接受對手陣營個人主義式、逃避、甚至為當前社會反改革勢力提供助力的思考方向及做法。

（一）來自左翼陣營的批判

左翼陣營相關的思考和態度，和他們觀察南滿，特別是大連文壇發展風氣有密切關係。從歷史背景來看，自日俄戰爭（1904）後大連成為日本租領地關東州的中心，至此已達30年，滿洲國建立與東北政治主權更替，因此並未帶來本地人們重大變化和心理衝擊。本地都市化與工商發展相對而言成熟，更使群眾並不熱衷於追求政治意識形態的目標。仲公撰猛烈抨擊大連文學者「生活多是比較安定的，所以他們的作品是極其平淡的」，「寫寫布爾喬亞的閒情逸趣外，便是畸形的愛底呼聲。」甚至直指響濤社作家「除去掘掘日本死去的作家底墳墓外，幾乎是沒什麼工作。」⁶¹

59 島魂（孫世翰），〈文藝通訊〉，「曉潮」，《滿洲報》，1935.02.01，8版。

60 王孟素，〈建設文壇及其他〉1-3，「民眾藝苑」，《民聲晚報》，1935.04.12、04.21、04.28，4版。此見2，1935.04.21。

61 駱駝生（仲公撰），〈文壇建設芻議〉，「文學七日刊」，《民聲晚報》，1935.03.10-05.19連載，4版。本處見1935.03.17所刊。

縱觀當時大連文壇及作品，此言不失其實。大連創作主要園地是日資《滿洲報》「北風」，以及華商集資《泰東日報》「文藝週刊」兩個文藝副刊，前者重要性與評價明顯高於後者。但無論就「北風」和「文藝週刊」作品來看，都可以看出深受日本自然主義風格的影響。

自然主義風格非但是日本文壇主流，更確立其近現代文學發展的精神，對接續而起包括唯美主義、新感覺派，甚至無產階級文學思潮，都曾產生影響。相對而言，中國自然主義僅盛行於二〇年代起初的兩三年間，隨即被寫實主義取代。主要是因為中日兩國對於自然主義追求純然、客觀真實世界和價值觀的接受態度不同所導致。⁶² 鄭清茂表明這種差異態度和兩國文學者所感知各自遭遇的時代背景有緊密關係。⁶³

日本自然主義作品並非完全缺乏人生目的，其強調破理顯實，客觀書寫，固然可能忽視群體解放，缺乏社會批判力道，卻透過呈現矛盾現實和自我解剖，發掘出現代人面對生活精神幻滅的狀態。⁶⁴ 當時盛行於大連的作品，多數卻傾向感覺化表達人性、聚焦在呈現人類生物性特徵的自然主義書寫態度，缺乏社會批判性以及共同意識的整合能力。譬如滿洲報編輯黃旭（本名黃甲東，即蕭艾）的〈文章與女人〉，刻畫三個分別代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作家，在面對自我職業身分認同和追求都市愛情生活，所產生各種複雜微妙的情感變化。但三個主角人物都皆形同丑角，表現出社會各階層扭曲的男女情欲、自我想像、臣服物質欲望前的個人行為心理。⁶⁵ 在〈桃李〉中，作者露骨揭發國民黨「北伐」過程中，各色人等打著國家統一旗幟，私下勾心鬥角，爭奪個人利益，情色糾葛、暗中無惡不作的複雜政經關係。但在這個理應屬「暴露黑暗」作品中，作者嘲弄人性低劣的興趣，顯然遠高於提出任何解決

62 參見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383-384；王向遠，〈五四時期中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提倡與日本自然主義〉，《國外文學》58期（1995.02），頁118-123。

63 即為表現現代化，日本文學者接受自然主義的理性思維，但為本地社會較落後的因素，自純左拉式的寫作轉向內在映照與主觀表現。中國文學者則縈繞強烈感時憂國情懷，因此雖擷取自然主義客觀、真實的表現技巧，追求的仍是寫實主義的載道精神。見鄭清茂著，賈植芳譯，〈日本文學思潮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賈植芳編，《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02），頁1-32。

64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頁358。

65 老舍（蕭艾），〈文章與女人〉，「北風」，《滿洲報》，1935.01.15—02.12連載，10版。

社會問題的方案。⁶⁶

並非只有大連右翼文學者作品有此風格表現。以何醴徵與王文泉（王世浚）為例，大內隆雄推崇前者作品能真實表現滿洲農村生活和滿人民族性，⁶⁷ 後者作品則當時被公認為34-35年間興起描寫「農村破產」等「社會的現象」的「農民小說」浪潮的代表。⁶⁸ 但就何氏與王氏實際作品，如〈子孫奶奶〉和〈兄弟之間〉來看，作者所著力呈現仍是群眾在農村衰敗破落環境與人們自我利益考量下，出現各種迷信、紛亂，乃至在自我價值矛盾下相互鬥爭等生物行為和心理。這確實不免讓人產生作者與評論者，可能都是不違背、甚至暗中配合殖民統治目的進行創作的懷疑。

不過，閱讀黃曼秋〈桃花未開〉，卻也可以找到自然主義風格滲入左翼文學作品的證據。在文本中，作者描寫年青女教師曼綺與男學生李莎間的感情糾葛。曼綺自幼失怙，內心始終感覺孤單，因此將感情轉移到學生身上，其中又以出身貧困的李莎最獲得其憐憫。二人雖然有師生間階級身分距離，卻逐漸萌發出未涉肉慾的男女愛情。⁶⁹ 李莎情竇初開的羞澀目光，曼綺在分離時流下的淚水，乃至超越階級意識與情感滌淨等層面，都可以看出試圖模仿川端康成早期作品《伊豆的舞娘》（伊豆の踊子）的痕跡。但文本中任意置入階級意識形態所顯示出作者在改革立場的模糊與徬徨，乃至因此造成情節方面的粗糙，卻也一望可知。

（二）來自右翼陣營的回擊

右翼回擊同樣來自對方陣營文學表現的觀察。左翼文學者除如島魂所標示創作量低落問題外，更嚴重是老命（王世浚，1912-1949，亦即石軍、文泉）所指出，左翼強調文學反映社會意識的觀點，其實是剽竊中國左翼寫實文風，

66 老舍（蕭艾），〈桃李〉，「北風」，《滿洲報》，1935.02.18-04.09連載，10版。

67 大內隆雄，〈最近の滿人文學〉，藝文年鑑編纂委員會編，《滿洲文藝年鑑》I（中國大連：滿洲文話會，1939.10），頁41。

68 夷夫，〈石軍及其作品〉，陳因編，《滿洲作家論集》（中國大連：實業印書館，1943.06），頁145。

69 黃曼秋，〈桃花未開〉，「北風」，《滿洲報》，1935.05.14，10版。

自我矮化不願意正視滿洲本地社會特色。⁷⁰

這個批評並非無的放矢。以努力（于明仁，1917-？，即田瑯）的戲劇作品〈石碑〉⁷¹來說，刻畫石匠為富人鑿碑立傳，賣命工作、受傷得不到照護，依然無法謀得妻孥一家溫飽。作者表現勞動者「為人做嫁」傳統文學主題的企圖明顯，意識形態操控下卻造成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設定平庸單調、對話矯柔做作等缺陷，著實令人無法卒睹。

楊進〈潰堤〉⁷²無論就主題、人物、情景設定來說，都可算是當時社會主義文學中較為上乘的作品。作者描寫洪水災難來臨前，村莊富人皆已四散逃生，只剩下離開土地便無法維持生計的窮苦村民死守河堤。巨大、無可抗力的天災與螻蟻般求生的人們形成強烈對比，題材本身便具有吸引讀者的強大張力，但作者在人物與情節塑造上卻依舊無法擺脫扁平化與刻板化，加上為宣揚意識形態卻脫序造成不合情理的結局，使得整篇作品頓失重心。

歸結來說，大連左翼文學者儘管掌握文學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這個核心概念，但是在辯證性的掌握生活現實，做為創作方法上，卻深受拉普（RAAP，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理性思維主導概念的影響，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導致創作陷入模仿與空想的局限。⁷³

因此總體而言，當時大連文壇雖然獨樹一幟，但因過於偏向自然心理或社會意識形態操作，導致整體藝術成就，無論就內在心理意識或反映外在現實的層面，都瞠乎日、中文壇和作品之後。種種問題恐怕連中立文學者也無法否認，渡沙（王國強）在檢討1934年《泰東日報》的文藝創作時，便指出其間存在意識不集中、思想時常轉變，流於膚淺愛情，或不曾深入理解事物，卻具有旺盛的創作欲，或觀察雖然深入，文詞表達卻無法配合等缺點。⁷⁴可見文壇無

70 其指：「確實文人差不多都是些神經過敏者，古老的塞北，連貓頭鷹的嘯曲都聽不見，文人們早就在溫著江南『燕語鶯歌、花開葉放』的文章的美夢了，這確是文人說謊的通病。」見老命（王世俊），〈望風捕影說〉，「曉潮」，《滿洲報》，1935.02.15，8版。

71 努力（于明仁），〈石碑〉，「北風」，《滿洲報》，1935.06.25-07.09連載，10版。

72 楊進，〈潰堤〉，「北風」，《滿洲報》，1935.02.18-04.02連載，10版。

73 關於大連左翼文藝思想路線的討論，參見劉恆興，〈文學、主體與社會：「滿洲國」文壇建設論爭的起源與發展（1935-1936）〉，《文與哲》30期，頁138-149。

74 渡沙（王國強），〈一九三四年本報的文藝概觀〉，《泰東日報》（文藝週刊新年特號），1935.01.01，26版。

法進步及兩方持續對峙的局面，已在大連文學創作者的心理上投下巨大陰影。

五、台、滿、中之間：仲公撰和胡風的〈牛車〉翻譯

仲公撰此時翻譯〈牛車〉，除日本交流經驗影響外，應該也有借此回應對方無所作為批評，以及導正右翼對日本文學模仿傾向的意圖，因此針對作品內容、使用語言，乃至作者與譯者自身社會意識差距等問題都有過通盤思考。其心路歷程詳實地記載在〈附白〉：

本篇是台灣呂赫若君所作。呂君是一位新進作家，自從楊遠君底一篇〈報差〉，在《文學評論》第一卷第八號上當選，呂君則毅然而起。據該雜誌編者云：此〈牛車〉勝諸〈報差〉。想我冒然譯出獻與諸君，不謂多事吧？〈報差〉我也將著手譯之。朋友，要知道他們是和我們有相同之點呀！

可惜拙筆生澀，雖然譯過日文理論、隨筆散文等，從未敢一譯小說和詩。蓋因一國文字所表現的情緒和意識，最難用別一國文字絲毫不差底（反）映出來，好在台人的傳統觀念和習慣還近乎我們，比較還容易譯出。

只是譯稿裏的用語，也許不能沒有方言，也許不能沒有罕見的怪字。這都是因為我在可能的範圍內要用我們的語言來表現，來（對）映出原文語言所表現的情緒和意識。況且我日常所用的語言又極其雜，所以不免有南腔北調之嫌，祈諸公諒之，更不奢賜教。⁷⁵

容易理解的是仲氏以為台灣與滿洲國，皆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質控制下，因此兩地文壇「有相同之點」，有必要相互增進彼此瞭解。

語言方面說明也不難理解。仲公撰與吳坤煌從往甚密，對不久前發生的台灣話文爭議理應並不陌生。相關討論圍繞在台灣文壇究竟應該使用白話文（時

75 呂赫若著，沉默（仲公撰）譯，〈牛車·附白〉12，「北風」，《滿洲報》，1935.07.09，10版。

亦稱中華國語文）、台灣話（漳泉話）、日文（國語），客語乃至原住民語（蕃話）等進行創作。論爭過程中各方挺身捍衛各自認同之族群、文化、政治身分所屬的語言，甚至相互連結、彼此進行艱難反覆、糾纏甚苦且情緒激烈辯論。然而若撇開各自族群政治立場，可以發現鬥爭儘管激烈，其實問題早已演化出各方皆同意的最終定論。即所謂標準語言只是知識分子自我幻想出來的空中樓閣，支持者不妨各憑手段盡力推廣自身擁護的語言，但最終所謂「共同語言」的決定權，還是由台灣群眾擁有。其最終形式可能便是依於生活需求、情感愛憎和閱讀習慣，混同各種語言習慣所形成的語言。⁷⁶

滿洲國域內族群問題，甚至遠較台灣複雜，除漢、滿、蒙、回等外，尚有錫伯、鄂倫春、達斡爾等少數民族，以及仍不斷增加中的日、鮮、俄等國移民。而經過長時間融合，東北（滿洲）話文以中國北方話為骨幹，在語音、語義乃至語法上融合各種族群的語言，並使用大量舶來詞彙，使其與中國北方方言截然有別，形成獨樹一幟的「我們的語言」。⁷⁷即便如此，仲氏仍坦誠自己使用的語言極雜，有南腔北調之嫌，似指東北（滿洲）話文仍在持續融合發展中。

但〈附白〉中仍存在某些不易解的說法。特別是主張：「一國文字所表現的情緒和意識，最難用別一國文字絲毫不差底（反）映出來。」且宣稱「拙筆生澀」未曾翻譯日本文學作品的譯者，卻以「台人的傳統觀念和習慣還近乎我們」為由，著手翻譯以日文寫成的〈牛車〉。似乎意味著台、滿二者間除所面對現實政治狀況有共同點外，傳統觀念與習慣所形成文化與社會意識相近，亦足以使得譯者足以跨過語言距離而相互理解。

仲氏所謂的文化社會相近所指的是那些層面，台、滿間又如何在此基礎上形成相互理解，雙方可以產生那些共識交集，似乎並不是單從字面便可以獲得答案。本節內容即以仲氏譯文（下稱「仲譯」）與年代接近的胡風譯文（下稱

76 論者雖以傳統民族意識、教育體制、族群文化為依恃各有堅持，但皆無法反對「群眾使用」做為最終的原則。吳坤煌因此將語言問題歸結為：在解決共同社會意識問題之後，不同語言族群應該要融合擁有一種共通語言的文化。吳坤煌，〈台灣的鄉土文學論〉，《吳坤煌詩文集》，頁135。

77 見廖正剛、孟瑾，〈東北文化的肌膚——從歷史及認知角度看東北方言〉，《東北亞論壇》17卷2期（2008.02），頁125-129。

「胡譯」) 對比，針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牛車〉故事始於楊添丁一家黃昏團聚。跳脫家庭晚餐溫馨團圓的既定印象，小說一開頭便描寫年方9歲，因父母失和而陷入極度焦慮感的木春，對幼弟缺乏耐心，卻又同病相憐的矛盾心情，誘使讀者對該戶人家生活何以陷入困境原因產生好奇。透過楊添丁與妻子阿梅的衝突，作者逐層展現箇中原由。楊添丁首先責備妻子晚歸，阿梅則在委屈下全力反擊，以為這都是男人不努力賺錢，讓自己必須到工廠出賣勞力所造成的。陷入極端挫折、勞累的夫妻雙方，終於在男人是否好逸惡勞的問題爆發嚴重爭執，並且上演全武行：

[原作]「馬鹿ッ！」カツとなつた楊添丁はさう叫びながら近寄つて、女の髪を握りしめてぐいと引張つた。阿梅は悲鳴をあげてのけぞり、手近にあつた茶碗を掴んで男に投つけた。小さい方の子供が聲を上げて泣き出した。

「貧乏するのも運だ。この阿女は——」

掴み合ひは何時ものことだ——と瞬間思ひ出して、楊添丁は血走つた眼で女房を睨んだ。

「——なんで、あくまで俺が怠けで儲けないと云ふのだ？」⁷⁸

[仲譯]「混蛋！」按不住氣的楊添丁這樣地罵了一聲，便進前來抓住老婆底頭髮，用力地揪。阿梅怪叫一聲掙脫了，拾起來手底下的飯碗，便打向男人去了。小的那一個孩子，放聲大哭起來了。「窮，也是命啊！這個臭老婆——」

開交手仗是常事——偶爾想起來這個的楊添丁底血紅的眼睛，瞪著老婆子了：「——為什麼，至死是說我懶，才賺不到錢哪？」⁷⁹

78 呂赫若，〈牛車〉，黃英哲等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9.07），頁12-13。

79 呂赫若著，沉默（仲公撰）譯，〈牛車〉2，「北風」，《滿洲報》，1935.04.20，10版。

[胡譯]「混蛋！」惱火了的楊添丁這樣叫著，跑攏去把女人的頭髮抓住，用力一拖。阿梅慘叫了一聲，仰倒在地上，抓起手邊的碗向男人拋去。小的孩子大聲地哭了。「貧窮也是命，這個混賬的女人……」（以下譯者刪節）⁸⁰

二人失和動武表面是經濟原因，但較細心讀者可以發現，更為根本因素卻是在這場紛爭中，楊添丁和阿梅都希望對方能理解自己的犧牲付出，並得到安慰支持，卻始終未能如願，甚至反遭受對方誤解和羞辱所造成結果。

胡風譯文簡潔中肯，丈夫火爆脾氣與妻子冰冷態度更加鮮明，意圖使讀者更能體會、同情殖民地底層群眾生活在經濟剝削下所承受下的壓力不幸，⁸¹使得作品主題朝向階級意識形態傾斜。

這種解讀也表現在胡風對原文刪汰部份。從閱讀（與翻譯）邏輯來說，這種刪汰並非毫無理由：楊添丁承受經濟壓力、遷怒妻子前文已有清楚表現。透過「貧乏すゐのも運だ」（[胡譯]貧窮也是命）一句，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其惱羞成怒動手的動機。原文後續出現的兩段（句），就情節來說似乎完全沒有必要。

但若就情感轉折位置來說，遭胡風汰除的兩句卻正好是呂赫若以為夫妻失和關鍵：儘管彼此存在感情和期望，但是面對超出個人情感與意志力控制、只能被動接受現代化變遷，雙方情感已經滲透進無以名狀的不安全感。仲公撰因此在譯文中保留此段文字，一方面以本地方言「交手仗」（肉搏戰）形容夫妻動手拉扯，殺紅眼般地「奮不顧身」，一方面將「女房」（日文）譯為「老婆子」，⁸²精準呈現原作衝突的鬧劇場面。在夫妻相互指責的言語中，如實表達原作中人物內心欲語還休般幽微情感，也為事件後來悲劇性發展埋下可信的伏筆。

換言之，楊添丁原本是一個囿於傳統、因循舊習的小人物，生活形態改

80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17。

81 胡風本人亦承認了此一解讀方式。見胡風，〈《山靈》序〉，《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中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04），頁I-II。

82 日文中「女房」（NYOUBOU）相較家內、妻等同義詞，帶有較個人情感色彩，尤其相較前文所使用的「女」及「阿女」。老婆子系以「老婆」為詞根加「子」為後綴而形成的詞組，東北話文中亦有近稱之意。如蕭紅〈橋〉中即以夫名（黃良）加子稱呼女主角（黃良子）。

變伴隨妻子不諒解形成沉重的心理壓力，在在強迫他必須去承擔無法負荷的挑戰，呂赫若透過人物自道方式表白了這種心情：

[原作]真面目さが足らなかつたらうか——と楊添丁は自問自答した。いや、昔よりは百倍の真面目さを出してやつてゐるのだ、一日として怠けたことがない。考へれば考へる程、女房が怠け者だ、意久地なしだと毎日衝いてかゝるのが、短氣な彼だけに癪に障り女房を打ち殺したい氣もした。併し、それも生活のための心配事からだと後で靜かに考へ直すと、憎らしい氣持は消えてしまふのが度々であつた。あくまで生活の上に何か自分たちとかけ離れたある目に見えない壓迫と戦つ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に心が焦れた。⁸³

因為胡風、仲公撰閱讀翻譯心態各有偏重，下列譯文便出現如此不同：

[仲譯]也許是因為沒有十分的勤儉？——楊添丁便這樣地自問自答起來了。不對，比以前是勤儉了、也有一百倍呀，一天也沒有懶過！越想越覺得，老婆子天天用懶東西、沒有助氣來搶白他，使脾氣暴的他，也想過要把老婆子打死，但是，以後慢慢地另想到她也是因為為生活而憂心呀！討厭她的心情便也消失了。這本是常事。於是他不得不自始至終，為和那不怪自己、某種用眼睛看不見的別扭去鏖戰而焦慮著。⁸⁴

[胡譯]自己不夠認真麼？——楊添丁自己問自己。不，比以前要認真一百倍，一天都沒有偷懶過。老婆每天罵自己是懶人、沒有用，性子燥的他越想越氣，甚至想把老婆打死。但過後靜靜地想到那也是因為擔心生活，憎惡的心境就常常消失了。在生活上面，不得不頑強地和某種同

83 呂赫若，〈牛車〉，《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頁13。

84 呂赫若著，沉默譯，〈牛車〉2，「北風」，《滿洲報》，1935.04.30，10版。

自己們離開了眼睛看不見的壓迫搏戰下去，這使他們心焦。⁸⁵

比較兩段譯文，可以發現胡風翻譯，在最後一段尤其明顯，模糊甚至改變人物敘述模式，使得楊添丁的悲劇，讀來彷彿只是殖民地生產模式轉型與經濟剝削所造成底層群眾正常生活無以為繼的普遍現象。但從仲公撰翻譯中，讀者卻可以理解這是物質條件變動改變人際關係情感，導致楊添丁陷入「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心理困境。

基於此種理念，〈牛車〉作者進一步擴大衝突場景，方便讀者理解何以人際關係情感層面的改變，相較物質生產模式的變化，對台灣鄉土社會發展有著致命影響。楊添丁上街拉生意遭到拒絕的情節原本十分單純，但卻因台灣鄉土社會獨特人際互動模式而顯得迂迴難解。

本段描寫集中在眾人彼此間對話，其中又交織著兩條主線，即傳統情誼與現實考量。以主角與米店老板互動來說，兩人雖是熟識，卻隨著社會位置改變而逐漸拉開雙方距離。即便如此，老板其實不願破壞彼此關係，特別當楊添丁刻意擺低姿態，進行求懇：

[原作]「でも、陳さん、自動車の行かれないところへ一つ俺の牛車を使つて呉れたら——」生活の必要を控へてるだけに、彼ははあ左様ですか——とさうさうはそのま、外に出られなかつた。

「それもさうだけだね。添丁、お前も考へて見な。それに間合はすためにリヤカーを三四臺も持つてる俺が、又車を頼む程商賣も大きくないし、それかといつてお前の牛車を使ふのも考へものだしね。——まあ、昔からよく運んで呉れたお前だからと考へないでもいんだが、今ぢや牛車は使へないからね。他處へでも行つて見ることだな。」椅子の上から米屋は親切な口調で駄目おした。⁸⁶

85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18。

86 呂赫若，〈牛車〉，《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頁15。

[仲譯]「可是，陳先生，汽車不能行的地方，請用一用我底牛車——」只是因為生活的必要在牽制著，他是不能，啊，是麼——這樣地潦草，便怎樣地進來，怎樣地去出。

「那也是那樣呢。添丁啊，你也要想一想，為著應付那個，我治了三、四輛載貨腳踏車。買賣還沒有那麼多，用不到雇車。說起來雇你底牛車還是一個難題哪——可是啊，我也並不是沒有想到，從大早你就給拉呀！可惜現在牛車是用不得的了，你只好到別處去打聽打聽吧！」坐在椅子上糧棧老板用懇切的口吻說了不成。⁸⁷

[胡譯]「但是陳老闆，汽車走不到的地方，請用一用我底牛車——」迫於生活底必要，他不能夠說是的是的就輕易走出去的。

「那固然是的。可是，添丁，你也想一想看。為了那，我有三四部腳踏貨車。又不是非雇車子不可的那種大生意。而且，用你底牛車也是不上算的。——是一向幫我運貨的你，這，我並不是沒有想過，但現在牛車不能用了。到別處去看看罷！」米店老闆從椅子上用親切的口氣拒絕了。⁸⁸

米店老板對楊添丁要求陷入兩難，既不願讓昔日夥伴失望，在商言商使用牛車運貨卻並不上算，這不免讓老板責怪起讓他為難的牛車來。透過胡風翻譯，讀者可以明確理解店主拒絕背後冷峻的現實利益考量。但在仲公撰翻譯中，卻更為精準呈現店主身處窘境，以及批評牛車背後，隱藏某種被迫面臨選擇的無奈。

後續當現場眾人對話集中在批評牛車的「過時」，這自然不免使主角感覺十分難堪——但相關對話皆是針對店主為難，以及不得不如此的功利決定開脫。仲氏譯文中積極地展示這些尖利言語背後情感的無奈和矛盾，而在胡譯中這些卻被忽略，且為刻意包裹的階級對立情緒所取代。

87 呂赫若著，沉默譯，〈牛車〉3，「北風」，《滿洲報》，1935.05.07，10版。

88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20-21。

主角確實能體會到眾人善意，但是對眾人只是在「費那些沒有用的心」（仲譯），或者說些「不花本錢的乖巧話」（胡譯），於自己並沒有立即實際幫助而氣憤離開。也因此浮現起接受眾人建議、放棄牛車改行種田的念頭，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但在災難性結局發生前，作者卻安排兩段具有重要提示意義的情節。首先是山裡蕉農——王生雇工段落，藉由提示台灣農業生產環境複雜，打破牛車必然被淘汰的迷思。雖然收入不多，楊添丁卻終於找到工作機會。

再者，此處也提供人際關係與物質生活的對比。山中蕉農王生並不富裕，但家族男女成員勤懇協力的狀況，卻與楊添丁夫妻為如何分工爭鬧不休情況分殊。但對已經接受街市眾人意見，盡力設法「脫貧」的楊添丁忽略這些，並將這個難得好運，當成是「貧乏人を助けるのはやはり貧乏人だけだな。」（幫助窮人的只有窮人呀）的結果。⁸⁹就原文上下文來看，卻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作者對楊添丁一心追求以物質條件，以改善夫妻生活想法的諷刺。王生初見面便指出趕牛車不是如此不堪，種田也並非光明坦途時，對此已經有了暗示。為避免讀者誤會，作者安排王、楊二人直接對話的場景：

[原作]「なあに——そんなことが……」と王生は一應否定した口調だったが、すぐに楊添丁の言葉の裏を感じたらしく「俺もね、始めは家族連れで擔いでゆかうかと思つたが、何しろ遠方だしどうしも駄目だァ。リヤカーなら一番いいんだがこれも貸して呉れる者は居ないからね。だからお前に頼んだ、よ。」⁹⁰

[仲譯]「什麼！那種事情……」王生曾一度是否定的口吻，但是又馬上像聽出來了楊添丁底話裡另一面的意思：「我也是呢，起頭打算和老婆、孩子們抗了去，但頭一件太遠了，怎地也不能成啊！載貨腳踏車可

89 呂赫若，〈牛車〉，《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頁20。

90 同註89。

最合適，但是沒有肯雇給我的呢！所以我才求了你的哪！」⁹¹

[胡譯]「說哪裡話！這點事情……」王生雖然是否定了的口氣，但好像感到了楊添丁話裡的意思，接著說：「起初我是想帶著家裡人挑去的，但路那麼遠，怎麼行。有腳踏車最好，但又沒有人肯借。所以煩勞你。」⁹²

種蕉收入不多，開出條件載貨腳踏車不願承攬運送，想靠自家勞動也力有未逮，無可奈何只好找上牛車。因此面對楊添丁滿心感激，王生原本以為只是客套，在理解對方的認真後，連忙表示自己對楊添丁願意托運芭蕉一樣充滿感謝。但在胡風譯文中，王生口吻聽起來卻真是一個「願意幫助窮人」的窮人了。

正因為楊添丁未從王生相處中，反省團結自足對生活的重要性，反而更執著於藉物質收入改變生活，夫妻兩人終於再度為錢反目且鬧上保正家。保正社會地位顯然較為顯赫，胡風翻譯中遣詞用字因此對其多所貶抑。⁹³保正是殖民者傀儡，本身並未具有任何調合家庭社會紛爭的見識、能力，甚至意願，確實是負面人物。然而作者塑造此一人物目的，用意卻顯然並非為提出民族主義式的批評，而是已為金錢勢力等淘空意義的傳統父家長制。

正是這位明明虛有其表，卻無恥地佔據社會要津的保正，使得社會人心更加墮落。儘管看清保正的虛偽無能，主角夫妻卻更加感受到金錢、地位對身為「人」的重要。種田，做為夫妻以為唯一的翻身夢想，顯得更為重要。妻子因此不顧羞恥下海賣淫，丈夫在僅夠糊口的微薄收入下自暴自棄。由此來說，保正家一段情節實具關鍵。仲公撰對此反映出較胡風為深的理解，比較下文即可見出：

91 呂赫若著，沉默譯，〈牛車〉5，「北風」，《滿洲報》，1935.05.21，10版。

92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27。

93 如將「夫婦見下した。」譯為「看不起地望了一望他們夫妻」。而在主角要求租田處將「飛んでもないといふ顔つきをした。」譯為「做出一個碰見了鬼似的臉色」見呂赫若，〈牛車〉，《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頁27、29；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36、38。

[原作]保正は何でも分つてるろやうな聲で云つて、夫婦見下した。
 「とても生活は難しからう。そこは夫婦がね……」そこで保正は夫婦
 和合協力の必要を應命に説きたてた。「不景氣、不景氣だつて、働い
 とるのに金が入らぬことがあるもんか。それが食ふ米に困るなんて、
 誰がしたことだアツ。家のことを考へぬ男奴、畜生ツ。」
 「この野郎、又——」男氣がカツと立つと、傍若無人だ。⁹⁴

[仲譯]保正像無論什麼都知道似地說，低頭看著他們夫妻倆。「生活，
 再沒有這樣困難的罷！於是乎做夫婦的啊……」保正可就大事論說起夫
 婦共同協力的必要了。「生意蕭條！就是生意蕭條，若真做活兒，還有
 不來財的道理！都讓吃的米窘著了，是誰的事啊？不顧家事的東西、畜
 生！」阿梅指手畫拳地喊著。
 「這個東西，又——」突然拿出了丈夫氣，真是旁若無人。⁹⁵

[胡譯]保正用了什麼都懂的聲音說著，看不起地望了一望他們夫婦。
 「生活很艱難罷。所以夫婦兩個……」在這裏，保正用勁地勸慰他們夫
 婦有和合協力的必要。「說不景氣不景氣，有做工賺不到錢的麼！米都
 沒有吃的，怪哪個？不顧家的忘入，畜生！」阿梅搖著手叫了起來。
 「這混蛋，又——」男的旁若無人地跳起來了。⁹⁶

腐化保正虛偽又自以為是的調停，以及夫妻並不買帳，自顧自爭吵的畫面，在仲氏譯文可謂真實呈現。但在胡風翻譯中，出現卻是一付宣揚國策、仗勢欺人的漢奸嘴臉。後者翻譯雖然加深讀者對殖民體制的認識，以及對楊添丁同情，但實然已遠離原作的創作意圖。

〈牛車〉深刻地描寫農村經濟困境，但楊添丁悲劇是否來自經濟破產，

94 呂赫若，〈牛車〉，《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頁27-28。

95 呂赫若著，沉默譯，〈牛車〉5，「北風」，《滿洲報》，1935.05.21，10版。

96 呂赫若著，胡風譯，〈牛車〉，《呂赫若集》，頁36-37。

其實大有疑問。首先楊添丁挺而走險、偷鵝入獄的結局，是生活壓力下不得不然，還是出於報復妻子無情，甚至自暴自棄心理的行為，本身便是細心讀者必然會產生的質疑。畢竟，從慣竊老林對吃牢飯遠比在外辛苦勞動輕鬆等的現身說法，及當農民對肥料與賣出價格不成比例而憂心時，楊添丁卻依然大做其轉行佃農美夢，無法滿足山村拖運僅夠糊口的微薄收入——似此等等，呂赫若在情感細節方面，都已經做出伏筆和鋪墊。再者，從呂赫若日後創作來看，都呈現越發難以單一階級亦或民族意識形態進行討論的傾向。⁹⁷

自此可以發現，殖民地文學文本雖然存在理解分歧的困難，但相較胡風，仲公撰對於呂赫若書寫殖民社會現代化問題所使用自然白描的筆法，有較深理解，也較能掌握作品中面對現代化分工和階級分化所造成時代與社會壓迫，乃至由此浮現的社會改革思想。或許正基於這些原因，仲公撰在南滿文壇建設相關爭議爆發時，選擇翻譯〈牛車〉，從而使大連成為呂赫若作品首次譯介刊行的場域。

六、代結語：大連文壇1935年後的轉變

從仲公撰1935年四月間透過〈文壇建設芻議〉開始討論文學意識形態問題，可以發現與東亞各地左翼人士交流以及翻譯〈牛車〉，無疑刺激他進行更深入反省思考。雖然這些反省後續在大連文壇間激起更大的辯論浪潮，對滿洲文壇發展無疑是正面的。但是，若要論定仲公撰翻譯〈牛車〉對滿洲文壇的具體影響，卻相當困難。其中讓人質疑是，滿洲文學者當時急欲開拓自身文壇，與世界文學接軌，譯介歐美、日本、俄國與中國許多重要文學者作品，其中不少獲得讀者關心和討論，〈牛車〉相關討論卻竟缺席其中。

但若從胡風〈送報伏〉翻譯在中國傳播，只獲得吉光片羽的回應，⁹⁸或許可以理解以台灣文學在民族、階級，乃至國際關係的複雜，即便有德永直，胡風等文壇有力人士宣揚與支持，讀者多會主動迴避討論。〈牛車〉在滿洲國

97 呂正惠，〈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頁45-66。

98 柳書琴，〈〈送報伏〉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台灣文學學報》29期，頁18-26。

流布也有類似問題。且更為不利的是，仲公撰以留學生身分受到殖民當局某種忠誠度信賴和保護，大膽指出兩地文壇「有相同之點」，但此言論實際上已經戳破官方宣稱滿洲是「新而獨立」國家的偽裝，點出其具有殖民地特性的事實。對多數滿洲國文學者來說，即便認同仲氏觀點，保持噤聲恐怕仍是更好選擇。⁹⁹

不過，雖然〈牛車〉刊出後，未如譯者期待受到重視討論，也不宜忽視其潛流影響。〈牛車〉刊出後大連文壇出現兩個明顯風格變化，首先是以「不言自明」自然主義筆法彰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取代原有「任其自然」風格成為大連文壇主流。趙孟原（小松）兩篇短篇小說〈孩子的悲哀〉和〈老人的悲哀〉便是很好例子。前者以兒童視角，陳述都市化過程中人們拋棄原有生活方式與親情關係，魚貫投入物質生產序列，離己而去的傷感。¹⁰⁰ 後者則幾乎是〈牛車〉翻版，描寫一輩子誠實賣豆漿的周老頭不敵「化學豆乳公司」無情競爭，喪失自我與生命意志與堅持的故事。¹⁰¹ 兩篇作品皆未強調階級或民族鬥爭，但是在主體感知的白描中，卻提供南滿社會快速往現代化發展，人們情感流動變化的剪影。

如果說前述變化，本就是日本自然主義的本質，且得力於滿系文學者在論爭中的反省，未必是〈牛車〉翻譯造成的影響，那麼大連文壇追求自我獨立與特殊性變化就值得慎重思考和推敲。岡田英樹討論大連文壇發展時，曾引述當時記者西村真一郎等意見，稱大連作家失去「與建國同步的對滿洲工作的熱情」，甚至「缺少進一步批評與活動的積極性。」產生與配合日本帝國政策「新京意識」對抗的所謂「大連意識」。¹⁰²

左翼文學作品的轉變特別明顯。以田瑯小說為例，〈父母的心〉¹⁰³ 描寫

99 相對於〈送報伏〉在台灣被禁止刊登的狀況，更不能不承認仲公撰提供翻譯、《滿洲報》編輯同意刊出〈牛車〉一文，在滿洲國是相當不易且富於勇氣的行為。從譯文中如日、清對比的字眼、乃至監獄、警察相關情節段落文字被刪除，都可以明確感受兩者所承擔的壓力。

100 小松（趙孟原），〈孩子的悲哀〉，「北風」，《滿洲報》，1936.04.24，10版。

101 小松（趙孟原），〈老人的悲哀〉，「北風」，《滿洲報》，1936.05.08，10版。

102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中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02），頁2-20。按：新京文壇的相關討論，亦見劉恆興，〈超越意識與新京文壇：以《大同報》副刊為中心的考察〉，柳書琴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頁157-186。

103 努力（于明仁），〈父母的心〉，「北風」，《滿洲報》，1935.09.03-10.08連載，10版。

佃農王老大被迫離土地，遷居都市貧民窟所發生一連串悲慘遭遇。儘管情節上看有強烈社會批判意圖，作者卻加強著墨於同屬勞動者間競爭、豔羨資產階級生活等，底層群眾被現實環境重壓所扭曲的絕望心理。雖然無法完全擺脫急於說教所產生人物扁平及情節不合情理的缺點，讀者因此已經可以感受到作品建築在現實生活而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同情。

〈環姑〉則描寫農村年青婦女因丈夫嗜賭，¹⁰⁴被迫到主角「我」家幫佣，兩人迅速發展出情感，但終於被丈夫出賣，成為流落街頭的下等妓女。情節看似脫胎於魯迅〈祝福〉和巴金的〈家〉，卻一反向傳統「投槍」，以及「革命+戀愛」基調，¹⁰⁵主角基於情感上愛戀，觀察和體會到女主角心中潛藏情感需求和人性尊嚴。如環姑對主角小心照護，但卻寧以「姐弟」盡心相待，而非伺候「少爺」。即便身為佣人卻不肯放棄爭取自我尊嚴，這使得環姑儘管命運乖舛，卻不像祥林嫂、鳴鳳般走向毀滅道路，最終更造成「我」深刻自省和尊重，顯露出透過勞動者心理意識，作者整合社會不同階級產生共同意識的創作企圖。

這種轉變從何而來？岡田氏以為是基於日本佔領大連日久，大連日人已與日本社會產生隔膜，因此否認滿洲文學只是日本文學的延長，追求「滿洲文學獨立性」結果。然而從大連人口組成、比例、職業別，乃至文化心理來說，大連日人都居於弱勢，單憑日系作家其實無法形成前述狀況。¹⁰⁶那麼，何以對日本自然主義風格亦步亦趨的大連滿系文學者，能快速超越原本模仿格局，成功開創出本地獨立性價值呢？這無法從「文壇建設論爭」和相關文學評論中直接找到答案，¹⁰⁷卻可以在仲公撰日本交流經驗、論爭發言脈絡，翻譯台灣文學想法，甚至〈牛車〉的翻譯文本，見到台、滿文壇發展過程中彼此的交集。

104 努力（于明仁），〈環姑〉，「北風」，《滿洲報》，1935.10.29-11.19連載，10版。

105 相關文本批評，參見周蕾著，陳惠芳譯，〈現代性和敘事——女性的細節描述〉，《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的閱讀記》（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11），頁167-215。

106 事實上西村真一郎大連意識說法是針對日系文學者往本地文壇靠攏傾向而發。見氏〈殖民地文学の再討—殖民地文学の一般論として〉，《滿洲文藝年鑑》1，頁20-22。

107 在相關討論中，滿洲文壇的特殊性確實曾被提出討論，卻是做為兩方相互攻擊、脅迫對方讓步藉口，本身卻並未被深入思考。此就仲公撰曾提出放棄滿洲轉往中國文壇發展想法可知。見劉恆興，〈文學、主體與社會：「滿洲國」文壇建設論爭的起源與發展（1935-1936）〉，《文與哲》30期，頁140-142。

一但拉長時間軸，雙方交集將會更加明晰。從〈牛車〉刊出後，以本地群眾生活現實為創作基礎，透過辯證性思考整合個人文藝風格追求與文學社會功能需求，在反壓迫的立場上統合不同階級建立統一社會共識，逐漸發展成滿系文學者共同方向。換言之，訴求鄉土特色文學主張開始具體浮現。

在這種文壇氛圍下，甚至可以看到已流亡中國的蕭紅，其作品〈橋〉於1936年中再度現身於大連文壇。¹⁰⁸該作品在處理城鄉生活，階級、性別，乃至於傳統等方面，都不似早期《生死場》般呈現激越社會對立，反而已有幾分《呼蘭河傳》等後期作品哀傷抒情意味。這股風潮同時刺激日系文學者如大谷健夫、古川哲次郎，以及前述西村真一郎，紛紛以國民文學、世界文學和殖民文學角度，提出反省、質疑或批判意見。¹⁰⁹在彼此激蕩下，山丁乃於1937年發表〈鄉土文學與〈山丁花〉〉中，正式提出鄉土文學的創作呼籲。¹¹⁰

從前述發展來看，仲氏選擇翻譯和發表〈牛車〉，對台、滿文學發展史都有重要意義。就滿洲國文壇方面來說，其不只代表左翼陣營對翻譯工作的看重，也提示對手陣營文學者不應只耽溺自然主義風格，在政治壓力下表現荒蕪人生觀，同時對自身陣營忽略內在意識整合的社會批判提出警示。若擴大來說，該譯作也使得滿洲文學者得以有機會藉鑑其他被壓迫地區文學創作，重新審視本地生活在文學社會實踐方面的重要性。這些在在都成為影響本地日後文藝發展的基礎。由此來看，仲氏譯介〈牛車〉理念和實踐無疑是成功的。在台灣文壇方面，當時此事所悉者為數甚少，更未引起討論，但如今有機會回顧這些史料，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發展詮釋，或許也能成為觸發反省思考的契機。

108 本作出現於巴金主編《文學叢刊》第三集第十二冊，1936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同名選集。但出版時卻僅標注寫作，未及刊登年月資料。該作是否首次發表於上海，因此容易啟人疑竇。事實也顯示該作品首刊地恐非上海，而是大連，1936年4月7日-4月24日以悄吟之名刊登《滿洲報》的「北風」副刊。悄吟（蕭紅），〈橋〉，「北風」，《滿洲報》，1936.04.07-04.24連載，10版。

109 見大谷健夫，〈土地と文學〉、西村真一郎，〈植民地文學の再検討—植民地文學の一般論として〉、古川哲次郎，〈在滿邦人の藝術立場〉，《滿洲文藝年鑑》I，頁17-26。

110 山丁（梁夢庚），〈鄉土文學與〈山丁花〉〉，《明明》1卷5期（1937.07），頁11。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丸山真男著，林明德譯，《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12）。
- ，區建英、劉岳兵譯，《日本的思想》（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05）。
- 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03）。
- 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08）。
- 白春燕，《普羅文學理論轉換期的驍將楊遠：1930年代台日普羅文學思潮越境交流》（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5.09）。
- 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
- 呂正惠，《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06）。
-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11）。
- 周蕾著，陳惠芳譯，《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的閱讀記》（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11）。
- 岡田英樹著，靳叢林譯，《偽滿洲國文學》（中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02）。
-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06）。
- 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05）。
- 柳書琴編，《東亞文學場：台灣、朝鮮、滿洲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涉》（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06）。
- 胡風，《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中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04）。
- 荊子馨著，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01）。
- 馬克思、恩格斯著，《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9卷（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
- 張恒豪編，《呂赫若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10）。

- 陳永國主編，《翻譯與後現代性》（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09）。
- 陳因編，《滿洲作家論集》（中國大連：實業印書館，1943.06）。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5）。
-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5）。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06）。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03）。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
- ，《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
- ，《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呂赫若（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9.07）。
- 葉渭渠，《日本文學思潮史》（中國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02）。
- 賈植芳編，《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02）。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第二冊（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05）。
-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09.10）。
- 藝文年鑑編纂委員會編，《滿洲文藝年鑑》I（中國大連：滿洲文話會，1939.10）。

二、期刊論文

- 大久保明男，〈滿洲国の留学生駱駝生と東京左連〉，《中国東北文化研究の広場·「滿洲国」文学研究会論集》2期（2009.03），頁137-156。
- 山丁（梁夢庚），〈鄉土文學與〈山丁花〉〉，《明明》1卷5期（1937.07），頁11。
- 山口守，〈作為契機的鄉土文學〉，《中國現代文學》24期（2013.12），頁21-42。
- 王向遠，〈五四時期中國自然主義文學的提倡與日本自然主義〉，《國外文學》58期（1995.02），頁118-123。
- 奇（葉榮鐘），〈發刊詞〉，《南音》創刊號（1932.01），頁1。
- ，〈第三文學提倡〉，《南音》1卷8號（1932.06），封面裡頁。
- 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伏〉——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

- 之楊達〉，《台灣文學學報》7期（2005.12），頁120-148。
- 柳書琴，〈〈送報伏〉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達小說的接受〉，《台灣文學學報》29期（2016.12），頁1-38。
- ，〈《台灣新民報》向右轉：賴慶與新民報日刊初期摩登化的文藝欄〉，《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2期（2012.08），頁1-39。
- 徐秀慧，〈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國大陸與台灣「文藝大眾化」的論述為例〉，《現代中文學刊》23期（2014.03），頁34-46。
- 廖正剛、孟瑾，〈東北文化的肌膚——從歷史及認知角度看東北方言〉，《東北亞論壇》17卷2期（2008.02），頁125-129。
- 劉恆興，〈文學、主體與社會：「滿洲國」文壇建設論爭的起源與發展（1935-1936）〉，《文與哲》30期（2017.06），頁129-178。
- 賴松輝，〈普羅文藝批評的文化轉向——論吳坤煌對鄉土文學的批判與繼承〉，《台灣文學學報》29期（2016.12），頁39-78。

三、報紙文章

- 小松（趙孟原），〈老人的悲哀〉，「北風」，《滿洲報》，1936.05.08，10版。
- ，〈孩子的悲哀〉，「北風」，《滿洲報》，1936.04.24，10版。
- 王氏琴（楊達），〈新聞配達夫—女性はかう見る〉，《台灣新聞》，1932.11.28。
- 王孟素，〈建設文壇及其他〉1-3，「民眾藝苑」，《民聲晚報》，1935.04.12、04.21、04.28，4版。
- 老舍（蕭艾），〈文章與女人〉，「北風」，《滿洲報》，1935.01.15-02.12連載，10版。
- ，〈桃李〉，「北風」，《滿洲報》，1935.02.18-04.09連載，10版。
- 老命（王世浚），〈望風捕影說〉，「曉潮」，《滿洲報》，1935.02.15，8版。
- 努力（于明仁），〈父母的心〉，「北風」，《滿洲報》，1935.09.03-10.08連載，10版。
- ，〈石碑〉，「北風」，《滿洲報》，1935.06.25-07.09連載，10版。
- ，〈環姑〉，「北風」，《滿洲報》，1935.10.29-11.19連載，10版。
- 呂赫若，〈處女作回憶——子曰空空如也〉，《興南新聞》4526號，1943.08.23，4版。
- 呂赫若著，沉默（仲公撰）譯，〈牛車〉1-12，「北風」，《滿洲報》，1935.04.23、

04.30、05.07、05.14、05.21、05.28、06.04、06.11、06.18、06.25、07.02、07.09連載，10版。

島魂（孫世翰），〈文藝通訊〉，「曉潮」，《滿洲報》，1935.02.01，8版。

悄吟（蕭紅），〈橋〉，「北風」，《滿洲報》，1936.04.07-04.24連載，10版。

渡沙（王國強），〈一九三四年本報的文藝概觀〉，《泰東日報》（文藝週刊新年特號），1935.01.01，26版。

黃曼秋，〈桃花未開〉，「北風」，《滿洲報》，1935.05.14，10版

楊進，〈潰堤〉，「北風」，《滿洲報》，1935.02.18-04.02連載，10版。

駱駝生（仲公撰），〈文壇建設芻議〉，「文學七日刊」，《民聲晚報》，1935.03.10-05.19連載，4版。

——，〈文藝通訊——附滕村人覆信〉，「曉潮」，《滿洲報》，1935.01.11，8版。

驚霓，〈給駱駝生〉，「曉潮」，《滿洲報》，1935.01.25，8版。

四、電子媒體

中條（宮本）百合子，〈新年号の『文学評論』その他〉青空文庫，1935.02（來源：http://www.aozora.gr.jp/cards/000311/files/2869_8457.html，檢索日期：2017.11.01）。

